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党的事业

陶 德 麟

党中央号召全党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项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战略措施。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和领导同志的多次讲话已经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我这里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的关系这个角度,谈谈个人的一些体会和认识。我的基本思路是:要坚持党的事业,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含糊地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了最终实现党的纲领,党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必须有一条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必须有大批能够正确理解和坚决贯彻这条路线的党员和干部;为使正确路线能够准确地卓有成效地贯彻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变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行动,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了使党的事业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还必须高度重视和有效地解决党的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要坚持党的事业就不能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想就沿着这个思路谈四个问题:(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纲领;(2)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路线;(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的接班人。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纲领

自从《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共产党人就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党的最高纲领。一百多年来各国共产党人的奋斗都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个纲领,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为这个纲领的最终实现奋斗了将近七十年,还要一直奋斗下去。一百多年来各种敌对势力反对共产党,说到底也就是反对党的纲领。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共活动,也仍然集中在反对党的纲领上。帝国主义不惜工本推行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国内敌对势力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归根结底就是要迫使共产党放弃自己的纲领。这是一场尖锐而持久的阶级斗争。共产党人要坚持自己的事业,就一刻也不能忘记党的纲领,就不能不与反对党的纲领的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这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关系呢?

用最简明的话来回答,就是:共产党的纲领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依据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最基础的东西。因此,只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理解党的纲领的科学性,才能自觉地为捍卫党的纲领而斗争。

* 本文是作者1990年1月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心学习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辅导报告。

对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不满，希望实现一种没有剥削压迫、财富公有、平等富裕的社会，这样的理想或者与此类似理想并非始于共产党人。中国从《礼记·礼运》《大同》篇到康有为的《大同书》^①，西方从16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到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提出过这类理想，有的还描绘了详细动人的蓝图。但是，所有这些学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当时的社会条件也没有成熟到可以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理论的程度。这些学说有两个共同的根本弱点：第一，它们观察问题的哲学工具都是唯心史观（当时也不可能有唯物史观），总是把精神现象看成社会变动的终极原因，把个别杰出人物看作社会变动的决定力量，它们无力科学地论证这种理想的客观依据和实现的必然性，只能乞援于抽象的“普遍人性”、“普遍道德原则”；至于为什么“人性”和“道德原则”恰好是它们所描绘的那样而不是别样，为什么“人性”和“道德原则”在不同的时代有那么大的殊异，它们对此只好缄口不言。第二，它们都不可能指出达到这种理想境界的实际可行的手段和途径。毛泽东说过：“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②这个评价适用于共产党人以外的一切提出过“大同”理想的人。这样的理想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崇高的、伟大的，但毕竟是空想。

共产党人的理想（集中表现在党的纲领中）与上述的理想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它不是空想而是科学。其所以如此，是由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容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在欧美主要国家中已经暴露得足够充分，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阶级斗争的阵线已经单纯化、明朗化，所谓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理性王国”的神话已被现实生活所粉碎。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历史向人们提出了不可回避的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是永恒的还是要灭亡的？如果是要灭亡的，那么取代它的将是什么制度？实现这种转变的途径将是怎样的？什么社会力量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先驱、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看到了这样的历史课题，并以他们的方式作了回答。但是他们的回答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科学地回答上述的历史课题，就必须有一套严整的理论，这种理论要确切地阐明社会的一般结构和发展规律，特别是要确切地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发展规律。而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对此却无能为力。其所以无能为力，固然由于当时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充分显示出作为新社会创造者的力量，但是更直接的原因却是他们的错误的唯心史观使他们找不到研究问题的正确途径。他们不知道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探求社会变动的根本原因，而把这种根本原因归结为第二性的精神现象。他们虽然也猛烈地批判、揭露、嘲讽、谴责资本主义的丑恶和罪孽，热情地期望建立美好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所能提出的理由说到底无非是资本主义不合乎“人性”，只有社会主义才合乎“人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则是由他们设计出一套规划，去说服、恳求资产阶级乃至王公贵族去赞助执行。这当然只能是注定碰壁的空想。

唯一科学地回答了上述历史课题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科学地回答上述的历史课题，除了社会条件的成熟和他们本人的革命家兼科学家的杰出品质之外，关键的一条就是因为他们哲学领域里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革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是在随便一种历史条件下都可以被某个天才人物偶然地创造出来的，它的出现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前提、自然科学前提和理论前提都已具备。关于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论述了。这里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所具有的空前的革命意义：第一，以往的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也都概括了若干自然的和社会的知识，但其中都有许多虚构、幻想和胡说，都用了许多编造的联系来填补当时还不知道的真实的联系，以完成它们的体系；并且它们总是把自己的体系说成永恒的、终极的真理。这就使它们不可能是科学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同于这种哲学，它的原理原则是严格地从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中概括出来的，它完全遵循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世界的途径，并且决不认为自己就结束了真理，而只是为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第二，以往的哲学只是这样那样地解释世界，好象同改造世界的实践没有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根本不同。它公开申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才可能认识世界；并且还公开申明，自己就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第三，以往的哲学在历史观上都陷入了唯心主义，都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的思想动机，而看不到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与此相应，它们都把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说成个别的英雄人物，而把人民群众只看成供英雄人物驱使的“群氓”。这就无法科学地认识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反对这种错误的唯心史观。它第一次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内在矛盾，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这种唯物史观使笼罩在历史领域的千年迷雾为之一扫，为人类提供了揭开历史之谜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结构，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个“秘密”，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走向灭亡的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又考察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地位和斗争的战略策略，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严整而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不是悲天悯人的救世方剂，不是安慰劳苦大众的福音书，而是以自然科学式的精确眼光考察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而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指南针，也是全人类实现最终解放的指南针。共产党的纲领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同其他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事情非常清楚：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暴露得十分充分，也不可能发现它的内在结构、发展规律和灭亡的必然性（即没有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揭示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和途径（即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一句话，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产生，共产党及其纲领也就没有科学根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纲领的血肉关系就是如此。

共产主义的敌人中凡是有一点理论知识和政治经验的，都懂得这种关系。他们要反对党的纲领就必然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充满着坚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当前我们又面临着这样的斗争。国际敌对势力对我们搞思想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其核心还是用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来顶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不遗余力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励之多年来就干这件事。尽管他根本不是搞哲学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别的哲学都很无知，但他还是要到处写文章、作报告，俨然以自然科学家兼哲学家的口吻狂妄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甚至从来就不对。刘晓波也一样，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东方专制主义”（他指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支柱。应该承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纲领的血肉联系是了解的，他们的反动的政治敏感性是相当强的。如果我们竟没有革命的政治敏感性，看不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就是他

们的反共活动的重要部分，以为那些哲学上的“争论”不过是书生们在沙龙里干的事情，与党的事业没有什么关系，不去关心和重视，那就是听任他们反共。为了捍卫党的纲领，就得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得学习、掌握以至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就不知道如何去捍卫。其实，方励之一类反共“精英”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些论点论据是非常浅薄脆弱，很不“过硬”的，他们无非是用一些“新”名词、“新”术语把某些从外国捡来的早就被马克思主义从科学上驳倒了陈旧不堪的观点装点起来，或者再加上歪曲地解释一点自然科学的新材料（连这一点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能力做到），用来蒙骗和吓唬那些缺乏理论素养的人而已。他们的“水平”实在很低很低，比他们的先辈们低得多。他们之所以能鼓噪一时，甚至博得一些廉价的喝采，一方面是由于有人支持纵容，使他们受不到应有的批判；一方面也由于放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削弱了理论上的识别能力。今后只要总结教训，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他们的那一套是无所施其伎的。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路线

党的纲领（这里说的是最高纲领）既定之后，为了保证它的逐步实现，党还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取决于思想路线是否正确。思想路线说到底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路线，才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据以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反之，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路线，只能导致错误的政治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先看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

我们党从成立到遵义会议的14年多时间里，是坚持党的纲领的，在斗争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也犯了几次大的错误，主要是一次右的错误和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的错误为害最烈，使党在苏区的力量损失了90%，在白区的力量损失了几乎100%。在这段时期党也不断地在纠正错误，领导人更换了多次。可是，纠正了右的错误又犯“左”的错误，纠正了一种“左”的错误又犯另一种更“左”的错误。错误的负责人改变了，错误的具体形态改变了，但错误本身没有消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很长的时期里也并没有为全党大多数同志所认识。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革命的前途是非常危险的。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毛泽东深刻地看出了事情的本质：历次错误路线尽管具体形态不同，有“左”有右，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就是都没有处理好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都犯了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错误，也就是主观主义的错误（表现为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物。所以，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本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是一场哲学思想的斗争。如果不把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斗争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不提高全党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那么当错误路线以变换了的形态出现时，党就仍然没有识别和抵制的能力，大多数同志还会上当受骗。这就抓住了一切错误路线的共同根源。这样，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就用极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尽管日理万机，还是亲自研究哲学问题，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不朽的名著和一系列其他的哲学著作，并且以这些著作的思想为武器，亲自领导了整风运动。结果是大大提高

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解决了两种哲学思想的矛盾，确立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指针，这才有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才有了党的“七大”，才赢得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

再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情况。

从建国到“文革”，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在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50年代后期，党在指导思想开始产生了一些偏离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东西，对形势的估量发生过若干错误，但还不是全局性的。到了十年“文革”，就发展成了全局性的错误，造成了一场灾难。林彪、江青等人的破坏为什么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得逞？为什么“文革”开始时竟会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狂热地拥护这场错误的运动？当然原因很复杂。但是主要的一条是林彪、江青等人从理论上、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搞乱了，造成“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的局面，使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遭到了破坏。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受到全面的歪曲。例如，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语录”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在对立统一规律问题上，只讲“斗争”不讲“同一”，而且把“斗争”同“对抗”混为一谈；在量变质变规律问题上，只讲质变不讲量变，宣扬不要量变准备的无休止的“质变”；在否定之否定规律问题上，宣扬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在历史观问题上，宣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倒过来”的“决定论”；颠倒人民群众与个人的关系，无限夸大个人的作用；等等。粉碎“四人帮”以后，本来应该立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两个“凡是”的思想又一度成了严重的障碍。两个“凡是”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为它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从哲学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邓小平同志抓住了事情的本质，他及时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①。在他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支持下，1978年举行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在当时却又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广泛的宣传，终于在理论界和广大干部、群众中澄清了哲学思想上的最大混乱，使人们懂得了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从而重新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才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转折，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现在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必然结论。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也是彻底的辩证法。但是，要正确地掌握和执行这条路线，把它体现在各个领域的具体的方针、政策、意见、办法中去，仍然少不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尽管路线本身正确，执行起来也会出偏差，犯错误。这些年来我们一方面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还有不少失误。为什么路线正确还会有失误？这原因当然不止一端。经验不足，认识过程本身的规律决定不可能一次达到真理，这些都是原因。但有些失误是与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不高有直接关系的。比如为什么有的人不顾国情，不考虑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盲目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措施等等无批判地搬到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来？为什么有的人不顾国力，提倡什么高消费？为什么在“两个基本点”上一手硬一手软？这些都与没有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观察问题有关。赵紫阳同志犯错误的原因很多，但是从哲学上说还是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还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李瑞环同志在发表于《求是》杂志上的文

章里举了好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赵紫阳同志非常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同志早就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语重心长地劝他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听不进去。我们同赵紫阳同志的情况当然不同，但他的这个教训我们也应当吸取。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路线正确了，还要有正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把正确路线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路线正确而方法失当，仍然会事与愿违，得到碰壁的结果。这里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是指那种只适用于个别或特殊领域的技术性的方法，例如成本核算的方法、医疗的方法之类，而是指适用于观察处理一切问题必须遵循的共同的指导原则，它是同哲学紧密联系着的。哲学本身就是方法论，也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定是主观片面，脱离实际，把人们引向失败的。我们党要求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只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的方法。

毛泽东对党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他不仅突出强调和精辟论证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从抽象的形式具体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易于理解、掌握和运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例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两点论和重点论，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等等。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等一系列系统地论述这些方法的重要著作。这些方法对做好各项工作都是尖锐的武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方法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的，它们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如果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些方法就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不可能深刻地领会和成功地运用，甚至可能把它们当成口诀，加以庸俗化，歪曲它们的精神实质，在工作中导致失误。所以，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必须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情况之复杂，任务之艰巨，遇到的新问题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不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适应新的情况加以丰富和发展，要取得工作上的成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这就更加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去分析一个一个的具体方法，只想就几个思想认识问题谈一些看法。

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不要从原则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原则，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原则，连“从实际出发”也是一条原则，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岂不违背了“不要从原则出发”的原则？岂不是自相矛盾？

这里显然是把从什么“出发”和以什么为“指导”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要想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首要的事情就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否则必然失败。所以，要办成一件事，必须对客观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从中引出意见、计划、方案、办法。这就是从实际出发。但是，从实际出发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哲学观点作指导。面对同样的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的人如果哲学观点不同，那么他们对事实的取舍，对事实的意义的估计，以及由事实引出的结论，包括意见、计划、方案、办法等等，也就往往不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是否可能不要任何哲学观点作指导呢？不可能。因为要思考就必须用概念，下判断，作推理，这就离不开哲学。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哲学观点作指导的人，就连两个简单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甚至连一个事实也陈述不出来，还谈得上什么从实际出发，从中引出什么结论呢？例如我们在调查

某种实际情况时，起码总得说诸如“甲事是乙事的原因”、“丙事是必然的，丁事是偶然的”、“戊事是假象，己事是真象”、“庚事只是形式，辛事才是内容”之类的话，否则调查的结果就成了一本狗肉账，毫无意义了。可是只要一说这些话，事实上就已经在使用哲学概念；而这些哲学概念在不同的哲学体系里是有不同的涵义的。如果按照那些坏的哲学赋予这些概念的涵义来使用它们，我们的判断就会发生错误，结论就会与实际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性不相符合。我们常说搞调查不要带“框框”，那是说不要在情况没有弄清之前就下结论，而不是说连哲学观点也不“带”。某种哲学观点的指导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只在于以什么哲学观点作指导，是自觉地还是自发地以某种哲学观点作指导。如果以科学的正确的哲学观点为指导，就能从实际出发引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以反科学的谬误的哲学观点为指导，即使辛辛苦苦地搜集了一大堆材料，得出的结论也将是谬误的。恩格斯当年曾尖锐地批评那些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说他们自以为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而其实恰恰做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其中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恰是最坏的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③。这是非常正确而深刻的批评，直到今天还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强调从实际出发的同时又决不能忘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就是由于这个道理。从实际出发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正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那么，可不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呢？不能这样说。因为“出发”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中已被赋予了确定的涵义。按照这种涵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只能解释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引出实际结论，包括意见、计划、方案、方法。而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原理只概括了最一般的规律，并不能代替具体的事实。假如要我们去处理某个工厂的某个问题，我们不去作调查研究，什么实际情况也不了解，单从对立统一规律或量变质变规律“出发”，能“引”出什么结论，“引”出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当然什么也“引”不出来。如果硬要“引”，那就是十足的主观主义，非碰破头不可。

第二个问题：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不可以与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挂钩”、“对号”？

我认为不可以。这种一一对应的办法有双重的不妥。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由许多原理组成的严密的有机的整体，正象列宁说过的那样是一块整钢。如果去掉一个原理，这整体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任何一条原理如果脱离了这个整体，被孤立地加以“运用”，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一条原理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关系理解为一个土豆和一袋土豆的关系。没有一个实际问题是可以靠孤立地“运用”一条哲学原理而得到正确解决的，这样的“运用”只会造成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并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关键时刻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④这个精神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适用的。第二，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每一条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整体为依据，而不是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条原理引申出来的。比如群众路线的方法的依据就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涉及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一种方法只与一条哲学原理“对号”、“挂钩”，那就既使方法走了样，又使原理走了样，“运用”起来是要出毛病的。

要正确地掌握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个问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不是可以保证不犯

错误？如果不能保证，学习与不学习又有什么区别？

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的方法就可以在实践中不犯任何错误，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方法反映的是一切事物共同的一般的规律，它没有、也不可能陈述千差万别的特殊事物的特殊规律，更不可能陈述各个个别事物的具体细节。如果把它说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以为只要学了它就无需具体知识和技能，既会治病，又会打仗，既会办工厂，又会办学校，无所不能而且万无一失，那完全是神话。第二，即使指导思想完全正确，在认识任何具体实际事物的时候也难免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例如具体知识的不足，材料的不足，客观过程的矛盾暴露的不够充分，无法预计的偶然事件的出现，等等，都可能使我们的认识与对象部分地不符合甚至全部不符合，也就是部分错误或全部错误。因此，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若干次的循环往复，纠正错误，才能达到主客观的统一。而且客观过程向前推进了，又需要再经过这样的循环往复，在这样的过程中又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对复杂对象的认识尤其如此。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认识的“一次完成论”倒恰恰是形而上学的幻想。所以，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方法给予我们绝对不犯错误的“保证”，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世上也绝对没有一种能“保证”人们不犯任何错误的科学。即使象数学和逻辑这样精密的科学也不能“保证”人们学了就不犯运算和推导上的错误，也没有人对它们作这样不合理的要求。既然如此，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它为根据的科学方法就要作这样的要求呢？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掌握它就没有什么意义，学不学都一样，那就是更大的误解。第一，它虽然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是在它的指导下对事物认识的全面程度和深刻程度是没有它的指导时不可能达到的。全部人类认识史证明了这一点。这就象数学虽然不能“保证”人们不犯运算或推导上的错误，可是一个精通数学的人能够解决的数学问题却是一个没有学过数学的人无法解决的一样。第二，它虽然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是在它的指导下由于别的主客观原因而造成的错误，在性质上是与由于背离了它而造成的错误根本不同的。当然，凡错误都是主观不符合客观。但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违反了事物的一般规律而造成的错误，不是一般的主客观不相符合，而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这种错误不是走向真理的阶梯，而是隔离真理的屏障。它会使人背离真理背道而驰，越走越远。这种错误往往是全局性的、方向性的，很难纠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由于其他主客观原因而发生的主客观不相符合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由于人们的认识没有违背事物的一般规律，这种错误也就不是根本方向的错误，而只是主客观之间还有距离，这种距离是不难通过纠正错误而逐步缩小以至消除的。它往往是真理的先导。仅就以上两点来看，掌握与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方法不是没有什么区别，而是确有天壤之别的。

通过认真学习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以它为根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就有了认识上的正确导向，就能够使我们的认识全面得多，深刻得多；就能够少犯错误，避免方向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错误；有了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比较容易找出错误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并把错误的教训变成宝贵的财富，变成向真理接近的阶梯。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的接班人

党的纲领的实现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奋斗。因此，要把党的

事业坚持到底，就必须把培养和造就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放到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这件事也是与学习、掌握、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密不可分的。

敌对势力从来就是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主义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帝国主义主要是用军事的办法来扼杀、摧毁共产主义，后来又主要是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来孤立、限制共产主义。在这些手段都失败了之后，他们转而主要采用“和平演变”的战略，即用“思想渗透”的办法，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瓦解、变质。他们的主要争夺对象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希望培植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把我们的接班人变成我们的掘墓人，最终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从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斗争，从党成立以来近七十年的斗争，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十年的斗争就会前功尽弃，几千万先烈流血牺牲和十多亿人民艰苦奋斗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去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暴乱以血与火的事实表明了帝国主义和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里应外合共同颠覆我们的政权的现实危险，表明了我们的青年一代被他们争夺过去的现实危险。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思想颠覆活动是无孔不入的。从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情况看，这种颠覆活动大体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层次是直接鼓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美妙”（包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私有制等等），攻击、丑化、诋毁四项基本原则，教唆青年反党反社会主义。另一个层次则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把青年“潜移默化”成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人，与马克思主义疏远、冷漠甚至抱着敌对态度的人。这两个层次的问题，说到底都离不开哲学。例如中国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到底就涉及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问题。抽象地谈“民主”、“自由”、“人权”究竟对不对？也涉及历史观的问题。不驳倒唯心史观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至于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与哲学的关系就更明显。现在青年中颇有市场的极端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精英”史观、无政府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非道德主义、非理性主义等等，本身就是哲学问题。有些青年盲目崇拜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等人，主要也是崇拜他们的哲学思想。哲学上的迷误必然使他们形成一套错误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而这又必然要支配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受这些“主义”毒害很深而又不能改正的人，要接受四项基本原则是很难设想的，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是不可可能的。因此，把他们从错误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唤醒过来，实在是一项关系到百年大计的任务。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要同时看到事情的两方面。

一方面，要对我们的青年有一个全面的、基本的估计，要看事情的本质。我们现在的青年一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的。他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同党的事业息息相关，没有任何根本矛盾。他们的绝大多数本质上是好的，是理应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的。如果不是清醒地坚定地相信这一点，而是仅仅根据一时一事的表现得出大多数青年都不可靠的结论，那实际上无异乎认定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阴谋是不可抵御的，无异乎认定党的事业必将半途而废。这当然是完全荒谬的、毫无根据的看法。现在青年中有些人的迷误，主要是由于经验阅历不够，是由于受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足，是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蛊惑和毒害。他们是完全可以教育好的。再则，那些使他们受害的错误观点无论怎样貌似高深，本质上毕竟不是真理。只要切实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些错误观点对青年的毒害是可以清除的。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前青年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是严重的。这些年来由于我们对帝国主

义和平演变、思想渗透的反革命战略放松了警惕，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进行一贯的有力的斗争，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在同敌对势力争夺青年的斗争中已经失去了一些阵地，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在思想上已经受到较大的毒害，要使他们摆脱迷误，接受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短时间里所能奏效的。同时，使他们陷入迷误的那些观点有不少是具有很浓的理论色彩的，也并不都是粗陋笨拙的胡说，甚至还能局部地抓住一些确实存在的现象，加上有的书籍旁征博引，名词术语成堆，很有迷惑性，要有理有据地揭露它们的本质上的谬误，从而使青年从思想上真正信服，也并非易事。简单化的“大批判”式的文章是只会帮倒忙的。做青年思想工作的人如果不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错误思潮作出科学的分析批判，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就有吃败仗的危险。只有自己通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有力地批判那些毒害青年的错误观点，去科学地解释引起青年思想困惑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问题，使他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他们正确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锐利武器，为党的事业献身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才能算是在培养党的事业的接班人的历史任务中取得了成功。

无论从战略上或战术上考虑，为了把党的事业一代一代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我们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

注释：

① 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于1901—1902年，当然远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但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从逻辑上说也可以把《大同书》的思想看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78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9页。

（本文责任编辑 杨小岩）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九、十期出版

我校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九、十期合刊，已经作为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出版。其篇幅比第八期增加了一倍多，为180余页，近30万字，收录论文18篇。这批论文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进行了研究、考证、辑校和补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该历史时期的部分史实；本期还有几篇文章反映了该研究室近年来在新兴的敦煌吐鲁番学方面的某些科研成果。

（墨林）